



再论萨拉是谁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潘家云

内容提要 为什么约翰·福尔斯反复看见幻象？他又怎样通过探究幻象创作出经典之作《法国中尉的女人》？萨拉到底是谁？本文结合福尔斯的手稿、日记、传记和心理分析研究后认为：萨拉幻象是福尔斯多种情结与理念的外化，《法国中尉的女人》像雄心勃勃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春梦。它融通了福尔斯的潜意识层面的天女情结、性幻想、局外人情结、恋母情结、创作心理自我分析、意识层面的立言留名的坚定意志、运用私人意象的创作策略、精微的审美诉求、遮遮掩掩的三角恋情、在类似主题上的反复深挖等。萨拉幻象是作者长期积累、长期练习、长期臆想、无意识发酵、内生性成长之后的厚积薄发。

关键词 萨拉 幻象 情结 创作心理 去神秘化

一、引言

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的经典名作《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女主人公萨拉起源于一个反复出现的神秘幻象：

（一个灰色的早晨），半梦半醒时刻的一个女性图像，她站在海岬边，背对着我。她穿着黑色衣服，她的姿态既有拒绝，又有嗔怪。这个图像的另



再论萨拉是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一特征是拒绝“进入”现代。我心里清楚，我想写被社会很不公平地流放的女人。但我从不喜欢历史小说，也无意写历史小说。我花了好几个月才接受这个现实：这个幽灵拒绝变成现代人。今天（1977年），我都不理解我当时为什么如此愚蠢，居然没看出那个女人是谁。它想表明我残存的肤色偏见，因为我潜意识中的某种东西在关键线索上欺骗了我。那个不愿回头的女人虽然身着黑衣，却有一张白人的脸。^①

这个幻象的怪异之处在于：意象清晰、意志坚定、情绪执拗、颜色灰黑、时代特征明显。起初，福尔斯认为这是“神话时代的静态图。因为自己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这种场景，所以置之不理”。但奇怪的是，“它反复出现。不知怎的，又不来了。于是我开始主动唤起它，假设它，分析它为什么会有某种内驱力。它神秘、模糊、浪漫……她显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象征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责备，一个被排斥的人。我不知道她犯了何罪，但我想保护她。我开始爱上她了，或爱上她的仪态（stance）”^②。如此刻意用力之后，萨拉从无意识的幕后走到意识的前台，“使得其他写作变成了一种干扰”（Wormhole: 14）。他于是放下其他稿件，开始“主动唤起她”，描述她，想象她，通过男叙事者查尔斯的眼睛，不断对她背后的故事进行设想、追问、演绎，最后发展出三种结局：（1）困苦中的萨拉给查尔斯写了一封信，查尔斯将它付之一炬，明智而现实地回到了订下婚约的蒂娜身边。（2）查尔斯驰援萨拉，并发生了亲密关系，他震惊地发现她并非弃妇而是处女。随后他自愿解除了与蒂娜的婚约，但萨拉却不辞而别。（3）查尔斯苦心寻找，最后发现萨拉在伦敦的另类画家罗塞蒂家中当模特儿，过着独立优雅的生活，并育有一女。萨拉坚守自由，坚辞查尔斯的求婚。自始至终，萨拉被不断地命名与改名：“法国中尉的女人”、弃妇、悲剧、妄想狂、精神病人、同性恋、模特儿、存在主义者等，难以捉摸。

萨拉是谁？阐释五花八门：（1）福尔斯当时的解释是，萨拉是潜意识里溢出的画面，“我收集各种两三个世纪前遗留下来的残存品、湮灭无闻的印刷品，

① John Fowles, Preface, in Claire de Durtfort, *Ourika*, Trans. John Fowles, Austin: W. Thomas Taylor, 1977, p. 8. 关于萨拉幻象的描述出现过三次，本文采用福尔斯的《“奥瑞卡”的译者前言》中的记录，因为它比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第13章和《未完的笔记》中的记录更仔细、更全面、更能有助于本文破解萨拉幻象。此记录收藏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兰瑟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福尔斯创立的手稿第32盒第9文件夹第8页，以后按HRC习惯记录成（HRC, Fowles; 32. 9. 8），只有内在逻辑清晰的资料才有页码。

② John Fowles, *Wormhole*, London: Vintage, 1999, p. 1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这些在无意识中留下了肥沃的原料,其中一些意象渗溢出来了”(Wormhole: 14)。(2)病态人格。(3)自私女性,丧失了爱的能力的女人,“我不想结婚,我不想分享我的生活。我希望我是我,而不是丈夫希望的我”^①。(4)聪明人,在令人窒息的社会里寻求自我解放而无所用其不及。(5)新女性,女性主义者,思想超前,不被接纳,自身深奥莫测,是加速男性成长的催化剂。(6)存在主义女英雄。^②她根据偶然(contingency)和自由来构建自己的生活,追求内心真实的“女作者”。^③(7)英国文学传统中“疯女人”的续写与创新,一个恶劣环境中顺势装疯的女性。^④(8)社会化不完全的边缘人,游离于社会自由、存在自由、叙事自由之间,在另类空间里被人接纳也接纳自我的人,她体现了三种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⑤(9)旧女性。她依然隐匿于男性的羽翼之下,并未摆脱隐性的父权话语枷锁。^⑥(10)性欲对象。福尔斯小说“本质上有一种窥视癖(voyeurism),痴迷于越轨色情的视觉体验,总企图洞穿他者的私人空间,并从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获得亲密之乐”^⑦。(11)萨拉只是一个男性臆想的神秘对象,男性构建的符号,有功能,无实在,有神秘性而无个性。^⑧(12)萨拉作为男性的他者和文本,不断被读,又拒绝被读透。“萨拉”经历了一个从极具个性的人物到其人性、女性、特性被逐渐抽空的过程,从叛逆者、边缘人,逐渐到一个毫无个性的符号、流动体、虚在体、欲望投射体、镜像等,囊括了自相矛盾的两极,张力巨大,难以定论。无论读者从何种角度入手,皆可自圆其说。这也许正是福尔斯的本意:他希望作品像一个罗莎墨迹测验——读者对不规则图形的想象与阐释其实反映的是自己的欲望和心态^⑨。

最契合福尔斯心意的分析是耶鲁大学临床精神分析学家吉伯特·罗斯的心理

① John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9, p. 352.

② See John V. Hagopian, "Bad Faith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pring (1982), pp. 191 - 201. 文中2、3、4、5点,皆是Hagopian对前人阐释的归纳与分析。

③ See Dwight Eddins, "John Fowles: Existence as Authorship",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 (1976), pp. 204 - 222.

④ 详见宁梅《论约翰·福尔斯对“疯女人”形象和和心理医生形象塑造的延续与创新》,载《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第152-158页。

⑤ See Richard P. Lynch, "Freedom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Spring (2002), pp. 50 - 76.

⑥ 详见陈榕《萨拉是自由的吗——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最后一个结尾》,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74-84页。

⑦ Brooke Lenz, *John Fowles: Visionary and Voyeur*, New York: Rodopi Press, 2008, p. 36.

⑧ See Magali Cornier Michael, "Who is Sarah: A Critique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s Feminism", in *Critique*, Summer (1987), pp. 225 - 236.

⑨ See John Fowles, *Magus*,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77, p. 10.

再论萨拉是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分析：萨拉是作者恋母情结的体现。她不答应查尔斯的求婚的真正原因是她是查尔斯母亲的化身，萨拉的女儿实际是查尔斯的妹妹。但恋母情结不是迷恋生理上的母亲，而是迷恋母亲所象征的生育能力和进入永恒的能力。作家通过创作获得母亲一样的生育能力，通过倾慕者的崇拜获得永恒和新生，萨拉是作者恋母情结的投射，记录了作者与母亲的分离与团聚。^① 福尔斯晒笑罗斯的论文细节荒唐，但结论却透彻地说出他常有的感觉。^②

经过多年思索后，福尔斯在《哈代与巫婆》中系统阐释了其创作心理的自我分析——“恋母情结”或心灵统一理论（Irredentist Theory）：写作是为了恢复那种母子一体的状态，婴儿完全融入母亲的身份之中……婴儿灵魂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是关于五官感受的流动的、形态各异的快乐记忆。这些带有自体色情（autoerotic experience）的细节如此深刻，以至于它们沉入潜意识之后，或在他成年之后，还不时逃逸出来干涉现实，迫使他试图重获母子一体的感受……艺术家总有一种反反复复的、无意识的努力，要重获那遥不可及的天人合一的原始状态（Wormhole: 163 - 164）。写作的目的就是回到一岁以前。由于不可能回到一岁以前，作家便不断向那个遥不可及的原始状态努力。^③ 从心理学角度看，创作——或对那遥不可及的母子合一的状态（oneness）的抒写——既可消灭自我身份带来的隔膜感和分离焦虑，又可保持心如明镜、感知敏锐的快乐心境。作家受快乐原则驱动，反复不断重写同一个模式的不同变体（variations），^④ 试图反复体验并尽量固化这种天真纯净的、无分离焦虑的快乐。因为这种抒写带有一定的男性自体性欲的色彩，且男性对母亲的驱力更强。所以，“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用文字来表达，也更擅长表达”（Wormhole: 63）。顺此逻辑，福尔斯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理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即男作家比女作家更优秀的主因是性别与

① See Gilbert Rose,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the Unconscious Significance of a Novel to its Author", in *American Imago*, 29 (1972), pp. 165 - 176.

② See Charles Drazin, *John Fowles Journals: volume 2*, London: Vintage, 2006, p. 10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HRC, Fowles: 1: 12; 18.

④ 这一点是作家与批评家的共识，福尔斯本人在《乌木塔》中也承认，“都是同一个主题的变体”（John Fowles, *Ebony Tower*, London: Honathan Cape, 1971, p. 1）。对他的采访或他人对他的评论都表明了这一点，如“所有的女性都是一个女性的变体”（Wormhole: 452）、“福尔斯的小说在深层次上是同一个故事”（Katherine Tarbox, *The Art of John Fowles*,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8, p. 2）、“几乎后期所有的小说都发轫于《魔法师》，都是《魔法师》的变体，都是不太成熟的主人公渴求心理成熟的过程描述。人本主义是父权主导下的人本主义”（Susana Onega, "Self, world, and art in the fiction of John Fowles",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Spring [1996], pp. 29 - 56）等，迈克斯威利则指出：“福尔斯是一个不断展示的作家，而不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Kerry McSweeney, "Withering into the truth: John Fowles and Daniel Martin", in *Critical Quarterly*, 4 [1978], pp. 31 - 38）。



情结。但是,从日记中看,福尔斯一直藐视母亲唠叨、麻木、没品位,在他听感人至深的音乐时把报纸弄得哗哗作响,大声地数针线活(此时他23岁,大学刚毕业)。(John: vol. II: 53)而且,1977年,他51岁时,正在写作《哈代与巫婆》,他的父母来访,他便假装非常忙碌,每天只下楼吃一顿晚饭,吃饭时还故意把电视声音开得特别响,以避免父母聊天。^①显然,“母亲”不是生理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精神母亲”。作家的“精神恋母”与“生理厌母”对比如此鲜明,且“父亲”永恒缺场,这不由得让人怀疑福尔斯自谓的“恋母情结”不太真实,至少是命名不准。“萨拉是谁”,还可深究。

二、无意识积累

美女如空谷幽兰又孤立无援,极易令男性想入非非。从福尔斯日记看,从13岁起,此类故事结构在他潜意识里早已生根发芽、反复演练多年,蓄积了强大的能量:

我以前经常做有关把女性囚禁于地下室的清醒幻想或夜梦。即使以后多次恋爱和幸福婚姻也没有终止过这种梦。它们没有变态的特征,只是追求而已。被绑架的女孩最后爱上了我,有时因为欣赏,有时因为无聊,我的陪伴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先从心理上了解我,而不是身体上。有时候,我把她们关在地下室,假装自己也是一样的受害者,以获得她的同情。^②

有一次,他还幻想着诱拐玛格丽特公主,还有影星们,“在贵族世界里从审美、社会、艺术角度去想象未来”。年轻的福尔斯对这些女性处在“孤立的极端环境”中的白日梦感到兴奋、满足、自足……“在我还没能独立思考前,我的内心世界就完全征服我了”。(Fowles: 33)

我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理机制,总是把自己放在极端情景里……正如我把性幻想也放在地窖、荒岛、冰天雪地的汽车里一样。(John: vol. I: 587)

囚禁,其实就是把我的个性与阳具强加给有关的女孩。(John: vol. I: 544)

^① See Eileen Warburton, *John Fowles: A Life in Two Worlds*, p. 37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 Fowles 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HRC, Fowles: 19. 6. 3.



再论萨拉是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收藏家》发表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蓝胡子性梦（bluebeard fantasy，杀妻主题），在给《邂逅》的文章中其实我隐瞒了一点：我说曾经经常“绑架和囚禁”抽象意义上的女孩——原型，其实，很多年来，这个原型常常是我认识的某个人——学生。（John：vol. I：550）

少年福尔斯这些白日梦的共同特征是：（1）理想女性被置于极端情景里，被动无助，不得不面对最本质的存在困境，存在主义特征呼之欲出。这也使得他幻想中的追求（wooing）带有居高临下的男权、暴力性质。（2）少女在学识、精神上处于被教导、被灌输、被塑造的心灵弱势，极大地满足了男性居高临下的灌注欲。他并非真的那么擅长凭空想象，而是依附现实女性，想象更趋容易，细节更易生动。（3）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即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情感相反，本来是女性自由自在，自己孤立无助、需要女性，但通过想象之后，变成女性孤立无助需要他，自己反客为主，可以放肆地对女性仰视、俯视、远视、细视，这种放肆不仅使人性心理上获得极大满足，其权力感也使人沉醉、“兴奋、满足、自足”。（4）自体性欲。在没有女性时通过臆想来满足归属感和被爱需要，带有意淫的自体性欲特征。对于上述性幻想，福尔斯开始时还非常羞耻，后来渐感舒适，终生不辍，类似男女互动成为他作品的基本框架。他自称一生只写过一个女性，其实他一个女性也没有写，只写了男性的性妄想。^①

上述引文本该发表在《我写作，我存在》、《邂逅》等报刊杂志中，但它们在发表前被删掉，足见如此赤裸裸的暴力色情乃社会禁忌。但是，正是这些不能见人的删除对揭示萨拉幻象和创作心理举足轻重。荣格曾深刻地论述了秘密、禁忌与幻象之间的紧密联系。秘密来自于禁忌的情感和欲望，秘密具有原罪或犯罪性质。秘密是暂时不被社会、文化、宗教所接受的一种情感，只能被隐藏、压抑、克制下来，这种感觉被压抑和克制后会使得保密者情绪恶劣和暴躁易怒。这种感觉被长期压抑后就会形成心结、情结、密结。它们独立存留于无意识中，自动自发地存在着，每当意识的压抑行动放松或者停止的时候，它们就冒出来，在睡眠中就表现为梦，在清醒放松状态则表现为幻觉。幻象是被压抑的情感、情结、密结、禁忌在无意识中的自发演绎的心理生活。^② 正因为福尔斯性幻想的禁

^① 参见潘家云《“窥”“破”愚妄：福尔斯作品中的妄想狂特征及评析》，载《国外文学》2009年第4期，第29-33页。

^② 详见荣格《未发现的自我与寻求灵魂的现代人》，张敦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11-112页。

忌特质，导致他半梦半醒时出现幻象。福尔斯的心理发展也的确服从了情结的一般规律，“在《收藏家》的接纳或倾吐之后，我再也没做过蓝胡子性梦，通过写作、自我分析，我经历了一种移情、散结、自恋满足的过程”^①。情结得到变形的满足之后，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在福尔斯自己都早已遗忘的日记中，笔者找到一个真实女性挺立船舷的身姿，神似萨拉，其审美性、主体性呼之欲出：

1958年8月6号至19号，法国度假。期盼久了。灰蒙蒙的天。在维多利亚港，被挤进旅游的人群、廉价的旅游群、学生派对、学生，人太多，真想掉头就走。船上更糟糕，到处是小孩子……那是一个阴天，尖利的风、暴雨欲来。甲板上到处是塑料饭碗，恶心。我们吃完午饭，看着小孩子们病怏怏地呆在船舷一侧。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救生艇架旁边，四个小时。可怕的意志力。我们都吃了抗晕船的药。^②

神秘女孩和萨拉在图像性上非常神似：（1）天气阴沉，风雨欲来，背景恶劣。（2）她与众不同，与其他人对比鲜明。她处身于混乱环境中，与病态、软弱、骚动的人群很不协调。（3）她向外望，面向法国，拒绝回头，拒绝转身，留给观察者一个永恒的背影。（4）背影美丽。神秘背影极具晕环效应，最能激发文学想象，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过女性的背影。（5）坚定性。她连续四个小时一动不动。这种坚定意志与福尔斯不顾一切的创作坚定性同声相应，形成共振。同时，女孩如此阳刚的气质已经隐隐触发了他的理想女性情结（*anima complex*），理想女性就应该如此美丽、坚定、神秘、可望而不可即，给男性造成永恒的失落感，让男性可以不断想象、重写、描述，却永远无法准确地描述。虽然这个与众不同的背影当时并未引发作者的强烈感慨，但她却没有消失，而是沉入了作者的潜意识，慢慢地发酵着。荣格认为：

潜意识由各种强烈的欲望、冲动、意象组成；可以由各种感知能力和知觉组成，可以由各种理性或非理性的思想、结论、归纳、演绎、前提组成，也可以由各种情感组成。意识心理中没有容纳它的空间，一些思想丧失了情

① HRC, Fowles: 19. 5.

② HRC, Fowles: 51. 14.

再论萨拉是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感能量，成为了阈限下的思想……被遗忘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终止其存在，而是兴趣发生转移，他先前所关注的事物就被置于阴影的黑暗之中。^①

荣格的意思是，所有经历都不会消失，不会被忘记，但会随着注意力转移而隐匿于潜意识中，等待相似情景的触发，获得能量的添加后再冒出头来，其隐伏时间要视它积累的能量的多少而定。所以，萨拉幻象的反复出现表明她早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潜藏已久，作者长期不知不觉的投射、主动想象、添加已经使她蕴藉了大量心理能量。也许福尔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1958年8月的惊鸿一瞥会在他脑海中潜伏11年，直到1969年的一天清晨，类似的背影会突然从潜意识中迸发出来，挥之不去。这种假性遗忘对福尔斯的创作具有高度的建设性意义，艾琳把福尔斯的这种记录、遗忘、添加、发酵、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的过程称为“丰富的遗忘”（fertile forgetting）（Fowles: 74）。他有意识地利用了自己的潜意识。

事实上，福尔斯的创作实践一直都遵循着这种从内向外的路数：情结投射、幻象触发、添加细节、创造故事。笔者在福尔斯手稿里找到一首数度精心修改，却始终没有发表的诗歌，大约它透露的秘密太多了：

《女主角》（1964年6月）

它始于虚无/抽象如谜之缺失/拟人化开始了。/它有了女性的形体。/总是有荣格，总是有弗洛伊德。/她被添上年龄、形体、眼神、手、脚、爱好、声调/她像一个玩偶。/我有时把她从书架上取下。

中提琴声。一页笔记。/我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又一页笔记，她从沉默中发出了声音。/我不让她说什么，她反而说什么/我写“停”“离开时逗留一下”/她反而走开/我说“悲伤”，她反而笑了。/有时，她反对一整章。/某一天，我躺在床上，她来了。脱下衣服，站着微笑。

我随叫随到，因为我时时等着。/有时，她不出现/有时，她随意出现，一下写出十幕。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她。/我跟着她。错了。/她只是一个鲜活的女孩，像她而已。/却远不如她真实。^②

① 荣格《潜意识与心灵成长》，张月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6-19页。

② HRC, Fowles: 52. 3.



此处，作者描述自己在并无创伤的情况下^①形成情结、看见缪斯、唤起幻象、创作作品的过程：在原初的虚无、神秘、抽象的心理状态下，作者起心动念，生起一个观念，然后不断地通过荣格的主动想象技术（active imagination）、投射（projection）和攀援，观念（或心理潜流）在引力原则下自动吸引类似的细节、图像，积累能量，观念不断地具体化、人性化、人格化，渐有女性的形体和生命，开始像“玩偶”一样被动，最后慢慢发展出自由意志，而且脾气很大，不听使唤，不请自来。然后她在作者的悉心“抚摩、关爱、聆听、关注、爱慕”下慢慢有了前沿的存在主义思想。最后作者居然在街上看到“她”——看到观念在现实中的投影。这首诗歌创作于1964年，简直可以看成1969年《法国中尉的女人》的预演，即观念自动吸引类似图像、细节、素材，形成情结，情结积聚足够能量后从无意识的后台进入意识的前台，形成幻象，幻象触发作家继续想象、追问、添加能量、使其清晰化、文本化，最后形成作品。

诗歌最后一节其实已经预言了他未来的作品结构与人生体验。5个月后，他在一个伦敦旧书店瞥见理想女性——一个酷似女演员吉丽弗·希拉里（Jennifer Hillary）的女孩时，触动了隐秘情结。在1964年11月2日的信中，他追问吉丽弗·希拉里是否在星期五下午去过一个旧书店，并解释道，“我在用自己作为一个实验标本，研究作家创造人物的神秘过程。”^②希拉里回答说没有去过。福尔斯接下来从弗洛伊德的理论角度对自己在旧书店的奇遇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剖析：美好女性象征着幻梦、神秘、诱惑、冒险、过去、恋母、可望而不可即的禁果，同时也象征着危及心理安全和婚姻稳定的危险。福尔斯常常被类似意象触发，引发他对自己的创作心理的探索。《收藏家》中的克莱格，也是先有理想女性的原型，看见米兰达后才会惊鸿一瞥，无聊的生活突然有了意义。后来在苦思冥想接近米兰达的办法时，无心瞥见一则老旧偏僻房子的售卖广告，立刻有了绑架的主

① 临床心理分析认为：“情结，一般由于创伤造成，是人格碎片（personality fragments），它从完整、和谐的人格内部分离出来，失去了与人格整体活动的一致性，变成一个具体、微小、独立的人格子系统，并且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内在性、自主性、情绪黏结性和动力性……实验表明，情结的强度或活动曲线具有波浪形的特征，每段波长可以达数小时，数天、数周或更长的时间……心理治疗就是要减少情结的干扰强度和持久性，使其意识化，增强自我力量和心灵重新整合的能力。”（范红霞、申荷永《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情结结构、功能及意义》，载《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年第4期，第310-313页）萨拉幻象的确符合具有“整体性、内在性、自主性、情绪黏结性和动力性”等情结特征，且福尔斯写作也带有“意识化，增强自我力量和心灵重新整合”的自疗自愈的特征。这首诗歌精彩之处在于它抵牾了心理学研究：幻象产生时无须创伤，仅凭观念（concept）即可，日思夜想，幻象即现。

② HRC, Fowles: 52. 6.



再论萨拉是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意。^① 同样,“《魔法师》也起源于一个意象。在一次无足轻重的旅游中,我们访问了希腊小岛上的一栋别墅,本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在潜意识中,我总是不断回到那栋别墅,总想什么事情在那里发生”(Wormholes: 16)。《狂想》发轫于一个不断从作家无意识中涌现的原始意象:一群没有动机、没有目的地、没有面孔的骑马旅行家们在荒凉的天际下走着,如无人照管的放映机上的卷轴。^② 意象触发、引出图像背后的故事几乎成了他的创作模式。意象是精神系统中不受意志控制的情绪体验,能精准地反映内心体验和心理密结,意象触发正是潜意识里情结的触动与外化的征兆之一。^③ 因此,他的观念、情结、臆想早在心内暗结珠胎,外界的美少女形象才会强烈地触动他,不然,“人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

关于萨拉还有最后的一个谜:为什么萨拉颜色复杂、外黑内白——一个黑色披风包裹着的备受排斥的白人?这个白人究竟暗指谁?福尔斯恍然大悟却又语焉不详,留下了另一个谜。这白人很可能就是福尔斯自己。首先,在理念上,福尔斯认为自我流放、自我边缘化是一种人生责任,“人应有三个政治和社会责任,即做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以承担起做人的责任;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不属于任何集团、组织、群体、派系、流派,这样才能确保个体的自由不受裹挟”(Wormholes: 10)。如此“三不”信念,导致他自然而然地走向存在主义,流连于存在的边缘,体验更多刻意的存在孤独与抉择焦虑。其次,在情感上,福尔斯深藏着一种局外人情结。牛津放假期间,他呆在家里,整月无言,和家人隔膜甚深(Fowles: 52)。像《魔法师》中的“鄙视自己的家族史”的尼克一样,他对自己的家族深感绝望:叔叔阿兰·福尔斯“阴暗、郁闷、困苦、单调的生活……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家传的(hereditary),所有福尔斯家族的男性都被这样诅咒着”(Fowles: 71)。认识到这种“平庸诅咒”,他拒绝认同于叔父、祖父、父亲、母亲。亲情上的隔离感、家族文化上的无认同感与他自己的精英感正面冲突,使他成为在家浪子(outcast)。所以,在翻译《奥瑞卡》时,他被奥瑞卡那种“黑人身份与欧美白人教育之间的冲突”感动:岂止外黑内白的奥瑞卡会被排斥,就像自己这样的出自牛津的精英白人也会被平庸白人排斥,无法融入小镇的平庸与狭隘。奥瑞卡实际上象征着“永恒的局外人”^④,即高贵内心与庸俗环境之间的

① See John Fowles, *The Collector*, Granada: Triad, 1981, p. 17.

② See John Fowles, *A Maggo*,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85, p. 2.

③ 详见朱建军《意象对话心理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年,第32-42页。

④ HRC, Fowles: 32. 9. 9.

永恒隔膜。同理，萨拉身披黑色披风，内心却是前沿理念，那种弥漫身心、无处可去的分离焦虑深深地触动了福尔斯。因此，奥瑞卡、福尔斯、萨拉之间的共性就是在家无家的局外人情结。

三、自觉意识引导

潜意识积累虽然重要，毕竟是一团混沌，最后还得靠明晰的意识去组织、辨识、整合。对作家而言，意志和意识的引领作用不可小觑。意志使作家的心理潜流产生高度的集中性、心理指向性和创作自觉性，为后期灵感突起打下基础。^①大约在23岁（1949年）左右，福尔斯开始思考上帝存在问题和死亡问题。死亡令他惊悚，“对自己变成空无，（他）感到非常恐惧……他意识到自己只是无垠洪荒中的微尘，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同时，他也接触到加缪的存在主义理论，感到“反叛突显人的尊严，（人必须）不断地直面自身的虚无”，而且，“艺术成就是一种补偿”，“永垂不朽是人的最高雄心”，尽管当时文笔稚嫩，他已经有了以不朽之艺术克服个体之湮灭的雄心并视“立言”为获得永恒的唯一方式。（Fowles: 61）在成名前漫长的15年的奋斗中，他贫寒、生病、害羞、不善社交、抑郁，害怕陷入与父母一样的平平庸庸、籍籍无名的状态，“丧失信心，害怕世界，只剩作家梦作为唯一的希望”（Fowles: 72-75），在随时随地都濒于崩溃的心理状态下，写作既是他逃避现实、逃避郁闷、逃避平庸的唯一手段，是他接通幻象世界、自我安慰的唯一方式，又是他彪炳千秋的唯一道路和唯一激情，写作的“雄心与能力的混合物使他坚定得不顾一切”（John: vol. I: 110）。在1963年《收藏家》一炮打响之前，他已经刻苦写作了15年左右，完成过10部无法发表的作品。

虽有这样的文学激情和不朽意志，但究竟用何文学策略来独树一帜呢？在写作《岛屿与希腊》（1953）时，他的原初的构想初露端倪。他想要“真正的神秘，而不是廉价的、人人都能想到的秘密……即通过唤起个人世界里的私人象征”（Fowles: 206）。他想要通过个人生活中的私人象征、亲身经历、情感经历来塑造一个永恒之谜。开始，他试图隐讳地描写1953年在希腊小岛斯巴沙上发生在他、伊莉萨白、罗伊（伊莉萨白的丈夫）之间的那段三角恋。他们同在希

① 详见王洪宝《作家心理潜流及灵感突起》，载《文艺评论》1985年第3期，第26-33页。

再论萨拉是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腊斯贝萨岛上教书，近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使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罗伊有抑郁、酗酒、闹酒的坏习惯，经常沉醉不醒。福尔斯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慢慢就走到了一起。1953年12月16日，福尔斯在激情、矛盾、内疚、绝望中完成了《岛屿与希腊》的初稿，他“想勾勒本质，却又要掩藏事实，所以，内疚、爱情、秘密、伊莉萨白是这个故事的主体”。伊莉萨白既是“澳大利亚军官的女人”的原型，也是法国中尉的女人萨拉的原型（Fowles：151 - 154）。这个不成功、未发表的饱含着个人情感和隐秘回忆的故事沉入他的潜意识，慢慢积累发酵着。当萨拉幻象反复出现几次之后，她的私人性、神秘性、浪漫性、审美性让他直觉感到：这是一个练习写作技巧的稍纵即逝的良机。所以，他主动去唤起它、探究它、培育它、破解它。刚开始时，他“并不想严肃，只是闷头去写一个爱情——神秘故事”（Fowles：84）。《法》只是一个“练习技巧的游戏之作，复杂的文学体操而已”^①，并无很多深意。但正是这种高度放松、一气呵成的作品，更真实地体现出作者的深层密结。

究竟何种女性既能“掩藏事实、又能勾勒本质”呢？法国作家阿兰·佛尼尔（Alain Fournier）的虚拟空间内的理想女性（Princesse lointaine in Domaine）让他找到了隔世知己。理想女性需要反复勾勒，不断重写，以不断接近理想之状态，^②她无须出于现实，只要能激励想象与创作即可。福尔斯渐次描写过三种女性：现实女性、幻想女性、原型女性。随着创作的深入，他越来越向内转，回退到个人想象中，描写第三种女性：既不是飘飘欲仙、遥不可及的理想女性莉莉莉，也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现实女性“艾利”，而是绝不受制于时空的、可用想象力将其从虚空中、从潜意识中捉来的“年轻、性感的女性——缪斯、阿尼玛原型、原始的母亲、女巫”（Fowles：369）。

福尔斯对原型女性的痴迷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他现实生活中男女关系很不如意，便沉湎于病态幻想中加以补偿。一方面，确有补偿之意，赢得和赢了女朋友的确给他一种胜利感；一方面，事实远非如此。他在现实生活中先后有过六七位有着肌肤之亲的女朋友，且都是在他经济困窘、自卑、自认无趣时结交的，足见他以语言和感情打动女朋友的水平非同一般。

既已谙熟女性的身心结构，为什么他总痴迷不改？又色而不病呢？首先，他

^① Daniel Halpern, "A Sort of Exile in Lyme Regis", in Dianne L. Vipond, 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Fowle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 p. 16.

^② See John Fowles, Foreword to "Alain Fournier: the Wonderer or the End of Youth", HRC, Fowles: 1. 1.

自认为是一个审美家而非好色鬼。他认为生命的秘密在于求乐，而乐来自于美（John: vol. I: 75）。他自己在审美品位上是贵族，暗暗要求自己第一任女友具有贵族气、风度、教养、美，他做白日梦时曾设想自己引诱玛格丽特公主（John: vol. I: 96）。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粗俗，可以说，他是一个以女性美为精神食粮的美食家、鉴赏家。正是这种美的追求使他超越粗俗、淫邪、污秽，使他自信自己与众不同。

其次，在他 137 页未发表的《美国啊，我为你哭泣》长文中，他阐释了自己的色情审美学：色情（erotic sex），“无论在观者还是演者心里，总带来快乐，激发一点点微量元素般的兄弟之爱（agapic love）、一点点良好感受，一丝相互的好感、性爱的诗意、纤弱的亲密交融”。而“淫秽（obscene sex）”中，那点兄弟之爱（agape）消失了，降低为生理紧张的缓解。淫秽过于直白、机械，反而使人无欲，只会满足那些弱者、阉人、性饥渴者、没有想象力的功利主义者的胃口。^①可见他对淫秽批判尖刻而对色爱褒扬有加：色中有乐、爱、诗、情、精微之意的萌动。色不粗俗、不直白、不功利，有私密性和自发性，能提升想象力、积极情绪、审美能力、创造力。色中的诗意（poetics）是产出、产生、创生、创造之意，色情与诗歌的共同点是审美、创造、想象、共情，这也许是福尔斯诗色一体，又色而不病的主因之一，美是他立名的手段。

为什么福尔斯坚信自己的心理结构是以恋母情结、理想女性情结为核心的呢？这点连他妻子伊丽莎白都不相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如此运气，和如此体谅女性的楷模生活在一起。”（Fowles: 392）在本文看来，作家的理想女性情结——总是想回退到与内心女性原型身心合体的渴望、对主客体未分前的不断追忆——更像一种对前镜像阶段的留恋，一种心理回退（regression），或者赤子之心情结，或者伊甸园情结，与“生理母亲”关系不大，而与自身内在一体感、整体感、天真感的碎落关系甚大。其次，渴望天真，并非向内投射形成自体性欲，而是将之向外投射到天真少女身上。对此四个细节可以证明：（1）在 1969 年 10 月 3. 11 处的日记中，福尔斯在纽约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做宣传时，记下了阅读纳博科夫的《爱达》的直觉感受：“我非常享受。只有那种有秘密花园的作家——就像我——才能懂得它真正在讲什么。我认为我比其他读者都更了解纳博科夫。就像我理解哈代、克莱尔一样，我们从心理上是一类人……纳博

① See John Fowles *America, I Weep For Thee* [unpublished], HRC, Fowles: 1. 3. 62-70.

再论萨拉是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心理研究

科夫是个邪恶肮脏的老家伙，作品更像手淫，老年人美美地做着对年轻女孩的梦。在他的人格阴影中是肮脏、自恋、毫无用处的自我崇拜”。（*John*: vol. II: 64-67）这段同心相应的点评简直等于不打自招，读纳博科夫极大地满足了中年人在秘密花园里老牛啃嫩草的性幻想。（2）1966年，他写道：“少女永远吸引男性，强度太强了……天女（*houri*）与处女是唯一的抵抗衰老的方式。天女像咒语、护身符、抗衰老剂……给我们天女，我们才永不会变老。”^①（3）“很多年来，这个原型常常是我认识的某个人——学生。”（*John*: vol. I: 550）（4）在1990年（66岁时），妻子伊丽莎白白过世那年夏天，福尔斯和牛津大学二年级学生、崇拜者、21岁的艾琳娜（*Elena Van Leishout*）之间发生一段老少恋，谈婚论嫁到不顾一切、六亲不认的地步。他带着惊异与崇拜，为这位少女记下了五本半日记，对她的身体、衣服、行为充满了溢美之词。他自认为有一种补偿心理，“对性欲丧失后无意识的追思，渴望与能激发自己的女性呆在一起，只为人性的温存”（*Fowles*: 441）。简·瑞芙调侃他有一种少女迷狂（*nympholepsy*，迷狂，妄想狂或情欲增盛）……一种反常、持久、对不可获得之事物的迷狂（*Fowles*: 450）。细究一下福尔斯对萨拉式的天女、少女、处女如此乐著的原因：其一，性欲满足。天真少女象征极美，“天真美少女的死亡乃人生之极悲”^②，与天真少女恋爱则是人生极乐，福尔斯如此流连欲境，乃是要反复体验这种既纯真又不纯、既精神又肉体的初恋极乐。其二，孤独的童年使他社会化不足、心理停滞。其三，创生的乐趣。作家能“把女性幻象从虚空中捏造出来，让她们说和做真实女性绝不可能做的事情”^③。向美少女的心灵灌装自己的观念，揉捏、打磨成自己所谓的理想状态，这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造人运动。福尔斯称小说家为小说家上帝（*novelist-god*），是颇得造物之趣的心得之语。总之，恋母情结、阿尼玛情结似乎更像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术语，掩护着自己的“天女情结”。

四、结语

意象是连接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桥梁，深析萨拉幻象与作者日记，读者可以进入福尔斯的潜意识，得知幻象背后的诱因，发现《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

① HRC, *Fowles*: 35. 6

② Edgar Allan Po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 <http://xroads.virginia.edu/~HYPER/poe/composition.html>.

③ John Fowles, *Mantissa*, New York: J. R. Fowles, Ltd, 1982, p. 85.

心理机制。萨拉幻象最终物化成经典名作，其创作心理机制大约如下：（1）首先，作者将自己的性幻想、少女情结、恋母情结、局外人情结等投射到极端情景中的女性幻象身上，自己便居高临下地凝视她、呵护她、塑造她、洞穿她，这使得作品带有意淫、自体性欲、窥美癖倾向，其对理想女性的高调审美中隐伏着一股乏光、乏力、乏情、乏爱、不阳光、不阳刚、不豪迈的阴邪之气。^①（2）幻象激发，主动想象，内观（mindful）幻象互动，深度卷入女性身心，洞穿他者以洞穿自我，双向洞穿（inter-penetrate）来进行自我认识。认识自我是人类的永恒主题，此处作者抓住了人生的重点，使得作品具有普世性与永恒性。（3）情结解开。将自己的女性互动体验、积极想象、累积细节、生命意识、存在体验等鲜活细节以制谜解谜方式慢慢呈现，这创作过程是极其艰苦，其所需的巨大能量来自于前期情结累积的能量，也只有情结才能蕴积了如此大的能量。《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是一个使无意识意识化，关注、分析、疏泄情结的过程，其过程与诗歌《女主角》的描述相差无几。因此，神秘无比的萨拉其实是个空壳、容器、镜像、虚在，她弥漫着三种气韵：作者偷窥女性身心奥秘的阴邪之气；其次，萨拉不惧自我边缘化，坚守自由的存在主义正气，但此气非自生非内生，而是作者的灌注。此二气，众人已有揭示，只是很少和作者的心理结构联系起来。再者，萨拉幻象也寄寓着福尔斯立言以求不朽的志气，此意志将萨拉幻象从虚空中呼唤出来，使她成为超越个体局限、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手段。若将这“两正一邪”之气（志气、正气、阴气）联系起来看，《法国中尉的女人》就像雄心勃勃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春梦。总之，《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作者的色欲投射、情结、性情、意志、见解、真实体验等内生性生长后的结晶，是作者一系列有目的、有意识的心理行为的长期累积，是作者身心体验的整体外现。

[作者简介] 潘家云，男，1969年生，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与心理分析。近期发表论文有《如何存在——论约翰·福尔斯对存在的领悟与刻画》（载《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等。

责任编辑：张 锦

^① 详见潘家云《女性原则还是阴性原则？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评约翰·福尔斯‘魔法师’的阴性特征》，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2013年第2期，第17-22页。